

卷首献辞

曾老——我心目中的高山与大海

——追忆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曾世英先生

高山仰止，

景行行止。

——《诗经·小雅·车辖》

曾世英先生(1899~1994)，曾老，对我这样一个晚辈、一个后学者来说，是一座高山，一片大海。山，仰之弥高；海，眺之弥广。

曾老，我一方面心仪甚久，另一方面实际聆教诲、亲警效的机缘，委实不是很多。但即使如此，追忆若干往事，仍历历如在目前。

一、为了纪念我永远崇敬的曾先生，提笔要写点什么时，思绪很快便将我带到数十年前的往事回忆里。时光老人虽然把这些尘封的往事埋藏在十分邃邈的历史深处，但依然仿佛发生在昨天，发生在刚刚飘然而逝的过去。

那是1936年秋冬之际，我正在小学五年级。我家的一位亲戚，知道我喜欢地理课，特地从上海带来两本地图，一大一小。小的是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《中国析类分省图》，大的是上海申报馆出版的《中国分省新图》。这份礼物可不轻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头一种地图装帧和印刷的精美（就当时我国地图出版的水平而论），编辑、设计的新颖，固然使我大感兴趣；而后者的分量，特别是分层设色，是见所未见，使我大开眼界，因而更爱不释手。头一种地图的编制者姓邹，名字是不是后来方知的邹新垓，已经记不大准，不好妄言；但后一种地图编著者的名字，却像锐利的刻刀，立即深深镌勒在我记忆的板页上，自始而终，清清楚楚，从来没有忘掉或记错一个字。他们是：

丁文江、翁文灏、曾世英。

最早知道曾先生，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当时我心想，这几位准是上了年纪的大学者，大科学家。其实，即使按地图集出版的年份算，那时曾先生也不过三十来岁，至于着手编绘之际，年纪就更轻了。

不久，抗战军兴，日寇对我家所在的城市，先是狂轰滥炸，继而咄咄逼临，学上不好了，时辍时停；这两本地图却像宝贝一样被我牢牢保存和随时携带在身边。直至1943

年,日寇发动中原战役,城市沦陷,我西入潼关,避走西安,这两本地图永远丢失,但“曾世英”这个名字,照旧存留在我的脑海里,丝毫没有受到影响。

二、1949年夏初我大学毕业,立即参军,后来很快来到北京,转入地方,继续我的爱好之一:就力之能及搜集点儿新出版的地图;顺便知道曾先生原在上海,不久转来北京。我对名人虽然仰慕,却没有前往拜访的意思,对曾先生自然也是如此。后来由于各种原因,虽然听说他在地图出版社(今中国地图出版社),我有时也到该社联系工作或购图,但从未一履先生之门,也没有随便打听。那时有各种会,我因无“缘”参与,自然无从有“谋面”之雅了。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其间,是否见过他,现在已印象毫无,不敢臆语。

我正式和曾老有所接触,是非常迟、非常迟的事了。那是1978年秋,由研究所出面延请专家到所,出席并听取我的提职论文报告会,其中包括曾先生。当时按我的揣度,他恐怕不克与会。一以路途太远,二以像他那样的前辈和大专家,似乎不会把这么一宗小事放在心上(当时就似有邀而未至的),花费这满可不花的时间。谁知曾先生竟准时莅临了。这既使我大喜过望,也未免吃了一惊。会后听别人介绍,曾先生已是79岁高龄,这使我除了吃惊上再加吃惊外,一种感谢和歉疚的心情油然而生……

三、1978年以后,我和曾老的接触就多起来了。有时是开会,有时是碰到问题向他求教。使我吃惊和感佩的事也越来越多。

一是他的平易近人,平等待人。“平易近人”和“平等待人”,说起来简单,作起来并不容易。尤其是像他这样大的专家、学者。和某些同代人待人接物的某些表现进行对比,越发觉得曾老的可亲、可钦、可敬。对这一点,凡是他的朋友、同事、学生以及周边的同志们,大约都有同感;具体到我个人,体会就越发深切。同曾老过往,从来没有感到他有一丝一毫居高临下、自高一等思想的流露,更不要说什么睥睨群伦、盛气凌人了。这方面的事例实在太多,举不胜举。

二是他虚怀若谷,不耻下问。我和曾先生相遇时,他有时会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商榷,或者就某一个问题征询意见,有时甚至会为此打电话过来。通过这些,对什么是虚怀若谷和不耻下问,我有了进一步理解。在这方面,给我印象尤深的,是1984年在北京西郊香山开有关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地理学》卷地名学词条稿的定稿会,我奉邀与会。刚一上山,就和曾先生碰面,他说:“你来了正好。我说一定要你来参加。”这使我既感到无限荣幸,又不胜惶恐之至。心想由您曾老亲自撰写或在您领导下分头撰写的词条,肯定是字斟句酌、千锤百炼的上好成果了,还要我这样的后学置喙吗?!这激发我在会上殚思极虑,哪怕有一得之愚,也要倾囊而出,作刍蕘之献。其原因之一,就是为了答谢曾先生。

三是他的奖掖后进,诲人不倦。他凭自己站立的学术高度和长期的工作体验,深知地名学的重要性,所以晚年显然特别关心我国地名学的发展;也可能同样深感我国现代地名学的起步之晚和后继乏人(或者说不够多吧),因而对于这方面的后进与后来者,表现了极大的奖掖和鼓励的热忱。当你发表一篇什么文章,见面时他总会说,“我看到你那篇东西了,写得不错。”赞许、欣慰之情,溢于言表,使人感到特别亲切,仿佛用一双温暖的大手,从前面拉,或从后面推,倾其全力,助你前进。这是一股莫大的鼓舞力量,使人不由地想到,曾老真关心人啊!由于曾老总是那么平易近人,和蔼可亲,和他接近、相处,丝毫没有拘束、隔膜之感,凡有见面机会,我喜欢向他请益、求教点什么。他照例有问必答,学术上毫不保守和保留。

当然,我从曾老身上见到的,绝不止这些。比如他豁达的性格,开朗的情怀,乐观的精神,与人为善的处世态度,严格守时的工作准则,朴实无华的生活习尚,寿登九秩依旧坚持锻炼的顽强意志,耄耋之年对“活到老,学到老”仍毫无放松的惊人执著,等等,等等。我虽然和他相识甚晚,谋面极少,但对他这些非常难得的高尚品德,仍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和感受。所有这些,曾老的朋友、同事或学生们,可能有更加具体、生动的记叙,我不多啰嗦了。

曾老的一生,是淡泊的一生,是令人景仰的一生,是有感染力的一生。

尊敬的曾老,我将永远师事您!永远永远……

前言(一)

关于外国地名的种种忧思

我,本书的著者,对外国地名,怀有深深的忧思。

读者诸君瞥见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,也许满腹生疑,不以为然:“区区外国地名有什么好忧思的,而且是‘深深’?莫非故弄玄虚,有意耸人听闻?”或者,即便不这么高度猜测、困惑,内心也许要画个大大的问号,以为著者是杞人忧天,庸人自扰;大概在无所事事,无病呻吟吧。

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?

著者既不故弄玄虚,也不拟耸人听闻;更非杞人忧天、庸人自扰;等等。实在是外国地名里面,值得忧思的端端绪绪太多。谓余不信,不妨摊开谈谈。

其实用不着大摊大开,只须稍微列举几许,读者诸君您,说不定就会感到许多情况是闻所未闻,思路顿开;就会点头称是,感到问题的确不少,不仅值得忧思,还很有必要整顿、清理一下了。

笔者对于外国地名到底都忧思些什么呢?这里无法彻底地一一详谈——时间、篇幅,都不允许。只好在已经搜寻到的数以百计的问题中加以挑选,仅就荦荦大者,展现、列举于下,以示一般(所列各条,没有什么严格顺序,不排座次,不论先后)。

忧思之一,意译外国地名频繁出现。音译外国地名,本来是古今中外共同遵循的原则。我们历代先贤同样尊奉、承袭。意译地名极其罕见;到了近代,外国某些地名的含义逐渐为人所知,意译外国地名慢慢衍生、增多,毕竟仍属偶一为之,偶尔见之。近来的书刊、报章中,不时“冒出”些意译(?)外国地名,就不免令人忧思。原因是采取意译,缺点甚多。比如势必出现重名,容易彼此混淆,造成混乱;容易误解,出现不相干的联想,导致误译;无从“复按”,难对原文(也就难辨正误);违背外国地名译名标准化要求;

无法与正规地图出版物参照、对应,等等。总之,问题丛生。

忧思之二,外国地名惯用译名屡遭忽视。外国地名惯用译名是人们长期“约定俗成”的产物,或具数百、上千年的历史。早已着于图录,见于载籍,一向深入人心,大家“耳熟能详”。却被有意无意弃之不顾,“炉灶”另起,徒增纷扰。

忧思之三,惯用外国地名译名横被扭曲。这类译名都有长期沿袭的固定用字和词形,但往往被轻易“糟改”,率尔变动。在某些书刊甚至工具书(包括地理学方面的专业工具书),乃至名家的文章中,频频出现此类地名失误。即便个别字眼之差,也使得人们如坠入五里雾中,无从识别;或者模样怪异,莫知所云。

忧思之四,对含有外国地名的外国成语理解上经常出现“食而不化”与“生吞活剥”的现象。译出来的东西,使不懂的人莫名其妙,懂的人不免为之汗颜。

忧思之五,对外国地名原名随意更动,使之“汉化”。外国地名有世代相传、长期沿袭的用语习惯和“固化”结构,却被随意割裂、变动,使之“改头换面”,甚至“汉化”,弄得不伦不类。

忧思之六,给外国地名译名附外语名漫无章法,形成“杂拌”。同一本书里,甚至同一篇文章里,给外国地名译名附加的外语名,忽而是原名,忽而是英语惯用名,忽而是其他来历不明的名称。没有原则、缺乏标准;杂乱无章,形同杂揉、拼凑。

忧思之七,使用外国地名译名,缺乏仔细、认真态度、同一个地名,在同一本书,同一篇文章甚至同一页上,出现不同的词形(不同用字、不同字数、不同格式等)。

忧思之八,翻译外国地名,粗疏、草率,用字顺手拈来,读音往往与原文语音——元、辅音或整个音节——对不上号。

忧思之九,引用外国地名,不核对,不查考,想当然地凭“感觉”走;甚至以讹传讹,“张冠李戴”。

忧思之十,有的外国地名本身并未更改,却想当然地认为已经更改,将这种不实的情况录之于文,还以为信息新鲜。

忧思之十一,有的外国地名已经更改,却固步自封,抱残守缺,不知搜寻新信息、查找新资料,对陈旧地名厮守不放,照旧使用。

忧思之十二,给外国地名,随意添加原本没有的成分,使得外国地名的结构,形成“重床架屋”,也无异“画蛇添足”。

忧思之十三,把外国地名原有的成分随意删减、剪除,施以“阉割”手术,弄得原地名缺肢少节,残折不全。

忧思之十四,外国地名只能引用,不能臆造。而有人自行攒装、调配。“闭门造车”,出门却无法“合辙”——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出处。

忧思之十五,外国地理文章,偏偏外国地名讹误处处,表现出相关方面专业知识的贫乏和不足。

忧思之十六,使用、引用日本地名,讹误重重:(1)昧于日本地名都有固定的汉字表示,一般可以照用,无须翻译。有人却将它们的罗马字母转写式,贸然仿照西洋地名“音译”,以致面目全非;(2)把日本地名与中国地名随意混同比照,甚至“认同”,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;(3)对日本地名的书写,漫不经心,用字顺手拈来,出现许多错别,还浑然不知;(4)把日本地名随意搬家,与其代表的实际处所远远脱离;(5)对日语简化汉字和汉语简化字不加区别(大约也不了解有什么区别),把日本某些地名,误用形似实非的汉语简化字取代,形成“地名怪胎”; (6)同一个地名,既列汉字名,又按汉字日语读音另行音译,以致“一名异形”同时并存(其他讹误,不及备述)。

忧思之十七,大批外国历史地名译名混乱,甚至很多头等重要的历史地名译名也不统一,形成译者、使用者、出版者“各自为政”状态,距离标准化遥远。

忧思之十八,对外国历史地名的诠释、缺失迭现:(1)史实不清,源流不明,考据不确,佐证不足,就遽下结论,其实往往禁不起推敲,站不住脚;(2)资料陈旧,疏于更新,每每以历史地名释历史地名,陷入“以旧释旧”的怪圈;(3)观点每每陈陈相因(检拾陈解旧说),难得破除迷信,与时俱进。

忧思之十九,对外国地名书写,存在种种闪失:漏写、赘写、错位、倒置、形似实非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忧思之二十,翻译外国地名,粗疏、轻率,用字随便。不加选择,甚至把一些避忌的字眼带入译名。

忧思之二十一,外国地名读音,随语言而大有差异。所以翻译时,不但“名从主人”,也要“音从主人”,惜乎不少人缺乏这种认识和观念,以为普天之下的地名,都只英语一个读法。来自多种语言的外国地名,率按英语的语音音译,很多地名的中译名因此和原名的读音大有出入,深违“音从主人”之道。

忧思之二十二,同一个外国地名译名多有歧出现象:(1)“自撰”译名与规范译名歧出;(2)不同学科间译名歧出;(3)同一学科内译名歧出;(4)不同译者间译名歧出。

忧思之二十三,用汉语方言的汉字读音翻译外国地名,不惟与惯用译名不符,往往单纯从语音近似的要求上看,与原名也难以碰拢。

忧思之二十四,翻译外国地名,原文没有看准、“吃透”,就率尔操觚,从而“夹生”,使人莫名其妙。

忧思之二十五,翻译外国地名,看走了眼,弄得“张三不是张三,李四不是李四”。

忧思之二十六,专门讲解汉语外来语词典的工具书,凡涉及外国地名,处理大都失准;对外国地名的“通专互换”尤其蒙昧,解释无法到位。

忧思之二十七,关于外国地名的工具书,基本概念模糊,不时误“他称(他国的称呼)”为“本称(本国的称呼)”,误“又译”为“又称”,以及其他“异、我相混”的违、讳现象。

忧思之二十八,有出版社,对外国地名的最重要组成部分——外国国名,采取极不严肃的玩忽态度:一套四本的出版物,金玉其外,世界各国英语名的讹误,竟然贯穿全书,数量之多,达到惊人的程度。

忧思之二十九,有人为文,古今不分,迭迭误外国历史地名为“现名”;或反过来,把现名当历史地名表述、介绍。

忧思之三十,外国地名派生的地名形容词,多半不被认识和认知。词形仅稍微变化,有人对之就仿佛“素昧平生”,别作其他地名处理,另行择字音译,结果与原生地名不侔,甚而南辕北辙,完全脱节。

忧思之三十一,对外国地名派生的语言名(与地名形容词同形,也不妨理解为地名形容词的词类变换,当表示语言的名词使用)来历不加了解,只知“墨守”词形,“忠实”音译,“雷池”未越,却与原生地名分道扬镳,形同陌路。这样译出的语言名也毫无用场,设若误用,必入歧途。

忧思之三十二,对外语的词类划分缺乏起码认识,对地名和由其派生的形容词分辨不清,误把外国地名形容词当地名使用,直接附列于外国地名(甚至包括国名)之后,从而犯这种不应有的低级错误。这种错误反复出现在专门考证外国地名的工具书里,格外不可思议。

忧思之三十三,对外国地名某些词形近似而含义迥庭的后缀,辨别不了,混而一之,造成误译。

忧思之三十四,有的外国地名原本简单,中译时被无端“戴冠”、“加冕”——补加本来没有的字、词,类乎“半创”(一半的创造),即使某些很常见(但很重要)的外国地名(甚至包括国名),也在所不免。

忧思之三十五,对外国地名望文生义,往不相干的普通名词上比附、联想,并据以发挥、“意译”,有的甚至积久不改,成了共识,其实大谬不然。

忧思之三十六,对外国地名“通”、“专”不识、不分。把应该意译的通名成分,“一锅煮”地误当专名成分混译。这样的译名既冗长、累赘,也难以理解,应用。

忧思之三十七,外国地名基本概念丁卯不分(虽最著名的词典也在所难免),想当然地讲解,人们也翕然从之,认为“正宗”。

忧思之三十八,翻译外国地名,缺乏应有的数的概念(很多外国语言的多种词类,都有“数”概念和配套的词形),对原名数的结构往往忽而略之,视而不见,或以为无足轻重,从而导致误译。

忧思之三十九,对外国地名的音译词形和意译词形,关系不明,辨别不清,误以为彼此是“两码事”,因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解释。

忧思之四十,对有的外国地名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往往误解、误释,由人引而用之,一错再错。

忧思之四十一,不懂外语地名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,在报纸上发表通讯,所附外语地名,全以小写字母开头。这虽然是个别现象,但有类型意义。

忧思之四十二,本来不同的外国地名,而且属于重要地名之列(首都、首府之类),中译时,却混淆为一个模样,既没有自纠,也不被他纠,遂如此这般地长期沿用,甚至迄今保留在地图集中。

忧思之四十三,形似的外国地名,中译时,本来“略施小计”,就能区别开的,却宛若束手无策,只能浑译,别无出路,而且一再因循不改,任其继续混同下去,混同至今。

忧思之四十四,翻译外国地名用字远离规范,不惟生僻字、怪字(国家主管机构发布的标准译音表里从不采用),赫然在目,又有这些字的奇异搭配、组合。很违外国地名翻译准则,却还可能自认是一种“创造”,一直保留在出版物中。

忧思之四十五,外国地名译名的讹误,有的还见之于中学教学辅导材料甚至教科书中。

忧思之四十六,其他有关外国地名及其翻译的奇怪现象举隅:(1)误甲为乙,或误二为一;(2)“异名同译”或“同名异译”;(3)误人名为地名,或误地名为人名;(4)有意无意引进大陆以外其他地区某些外国地名译名,用字怪异,让人有如猜谜,看不懂……

忧思之四十七,关于外国地名的引用、使用、翻译、传布……等等,尽管有这么多种各样的舛错、讹误,出现于各种各样的场合,可谓问题堆集。但好像没有怎么引起注意,鲜见有人为文——或其他什么途径、方式——揭举,议论。

……

够了,足了。著者关于外国地名的忧思,暂且“类举”到这个程度、这个地步为止。著者的忧思当然远不限于这些——大约一半也不到,但短纸“情”(事情之“情”也,非情感之“情”也)长,其它不得不舍弃与搁置,以待异日了。已经列举的这些,也仅仅算是非常简单的提纲,很多情况,只能这么“蜻蜓点水”样一语带过。对其中的诸般细节,无法展开详谈。好在凡举出的这些现象,本书正文大都有所论列,读者可以从容检

而阅之(少数兼顾未及,容另觅机缘补之)。

读者披阅以上数十条极其概略的叙述,当会悚然于外国地名值得忧思的地方之多,惊诧于它们涉及的方面之广,表现形式之五花八门、光怪陆离;谅也会因此颌首于著者的忧思,决非无由和无端,决非毫无分量,无足重轻。

良以我们知晓、熟悉和掌握(乃至探讨、研究)外国地名和外国地名知识,并非单纯从广知博闻的角度出发(这一点当然也很重要,对知识纯兴趣、无功利的广知博闻,于人们文化素养的充实与提高,大有裨益),而主要是为了社会生活层层层次、方方面面的多种需要,需它们为我们多种需要服务,很好地服务。但其间竟然存在如许多多、如许成堆的问题,岂不大有妨碍?岂不应该予以清理、清除,而且越彻底越好?

著者从事外国地名的探索和研究,对这些现象向有发现与察觉;内心深处早就浮现起缕缕忧思,给它们一个总名,就是本文“开宗明义”第一句话所说的:“外国地名的忧思”。一个时期以来,著者就此作思想上的不断酝酿、渐次形成若干想法、意见和建议,日积月累,郁集心头,使得时时感到如梗在喉,需一吐为快。正是在这种心情的涌动和引导下,常常不由自主、情不我禁地笔之于书,形之于文。至于是否粗陋浅简,在所不计。惟期这些微弱之声,能进入人们的耳鼓,引起适当的注意;假若人们能借此在使用(包括书写、翻译、引用等等)外国地名时,多所留心、多所惕避,以免重复出现忧思中的种种闪失和疏漏,那就如愿以偿,别无所求。有些话兴许近于直白,但口苦意甘,尚祈识者原宥。

自然,本书的内容,决不限于、远不限于著者忧思的这种种切切。否则干脆、索性、直截了当地把书名叫作《外国地名忧思录》,岂不更为名正言顺、表里如一?!不这样取名,正是因为书的内容所及,比忧思的这些,还要深广、宽泛得多。为此无须通读全书,只消粗粗翻检本书长达33页的目录,浏览这多约600则的文题,就会对全部内容触及的范围规模,了然于胸。但同样明显,本书确有相当多的论题和相当大的篇幅,和这些忧思直接、间接有关。有了这些内容,本书就显得更加丰满、充实,更显得有的放矢。也正由于著者对自己如许层层叠叠的忧思,感若重负在身,时时为之神锺心系。所以当展纸执笔,草拟本书的“前言”时,特别以《关于外国地名的种种忧思》为题,集中倾谈,而且把它作为“前言”的第一篇;以示它的重要性。不妨大胆断言,本书正是由于包含了如此多这方面的论题和内容,方显得更有价值,更有意义,更值得出版;一旦奉献于广大读者之前,更会获得读者的认可与欢迎,以为值得一读,很值得一读!

前言(二)

本书撰写缘起述略

著者多年来从事外国地理研究,主要侧重于世界社会—文化地理的某些领域,并略有获^①。而在年复一年的工作实践中,越来越感到外国地名的重要,越来越体会到外国地名知识对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础意义、潜在价值和多方功能。久而久之,进而发现外国地名知识素养在更大范围里的重要性;越发深刻体会和觉察到它的基础意义、潜在价值和多方功能,同样存在和表现于其他许许多多的学术研究、社会生活和活动中。从而深感开展外国地名的研究和探索,其功用、功能和价值影响所及,决不仅仅囿于外国地理研究乃至地理科学的诸多部门,其范围还要宽阔、广大得多。实例之繁,不胜枚举。因之就外国地名的种种切切,找出些问题,理出些头绪,解答些疑难,摆若干观点,作某些探讨……,无论对学术研究或社会活动的许多方面,都是必要和有裨益的。

须知,当今的世界(其实岂仅“当今”的世界!),很多活动常常会涉及外国地名,常常和外国地名有关。至于当今世界的诸般形势,如世界政治形势、世界经济形势、世界社会—文化形势、世界军事形势,以及由这些形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总

① 前此有若干著、编、译出版物问世。编著主要有《世界人文地理手册》、《世界自然地理手册》、《世界社会文化地理手册》、《世界地理之最词典》、《地名学论稿》、《英法德俄汉地理学词典》等;译书主要有《苏联的河流》、《波兰经济地理》、《印度的矿产资源》(以上译自俄语)、《地理学词典》、《地球科学百科全书》(以上译自英语)、《非洲》(上、下两卷集。译自法语)(以上面所列,有的是与友人等合作完成者)。分别由新知识出版社、知识出版社、上海辞书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、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出版。另有待出版的著述多种,不俱详。

的国际形势等等,同外国地名更表现出多方面、多层次的密切联系。显而易见,举凡世界各地,不拘发生什么活动、事件,往往径直以地名当头予以命名。缺了地名,这项活动或这宗事件,简直就不好称说。一言以蔽之,当今的世界事务和与之有关的各种社会活动,几乎都要同地名打交道,凡事几乎无不有地名穿插其间。地名不知不觉间经常、频繁、大量地在人们口头、笔下出现,并且广泛见之于报章,显之于屏幕,闻之于广播,以及出没于互联网……

但惜乎人们如此频繁调动、使用外国地名,而对于它们自身的种种“内情”,就似乎不太措意,或者比较(相当)隔膜,乃至不甚了了,知之甚少。这未免不是知识上的贫寡与缺失。更有进者,还难免因此出现差错、失误——轻则流为笑谈,重则贻误事功。这类实例,古今中外皆有,眼下还在不时出现。本书某些文章,就透露不少有关信息,提供不少实例。可以设想,人们假若对外国地名本身的诸般情况有所了解,多所了解,深所了解,那么,肯定既有助于丰富知识,增广见闻,扩展眼界,开阔视野,提高文化素养,更会因此获得许多意想不到、大有价值的实际工作效益——这同样是显而易见的。

二

千真万确:就历史渊源说,我国是一个地名研究的古国,也是一个地名研究的大国,历朝、历代辛勤积累并有幸流传至今的大批(可谓“汗牛充栋”,甚至“车载船装”)文献、资料,都清楚而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。但无庸讳言,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地名研究,我国开展得实在很为晚近,力量也十分薄弱,外国地名研究的开展尤其如此。与域外同一学科发展状况对照,无论规模与成果,都存在相当的差距。惟其如此,我们更应该急起直追,迎头赶上。著者本乎以上粗浅认识,深深感到无论从纯学术研究或更具体的各种大量工作要求衡量,我们都应该给予外国地名以足够的重视和注意。就个人而论,也同样本着这种认知和信念,多年前,就不揣势单力薄,兴味盎然地闯入这个学术阵地。自忖就个人的某些条件——包括多年的专业磨练、业务积蓄和外语素养,从事外国地名研究,大约差可应付,不妨勉为其难。

无如万事起头难,尤其“形势比人强”。在前此大环境(尤其“反右”和“文革”)诸多变迁的影响、牵掣和干扰下,心想事难成,甚至心想事不成。光阴任由飞驰,岁月累遭蹉跎。纵使有何雄心壮志,步履不得不边刁边干;工作不得不时举时辍。是以著者对外国地名的探索,虽然早自1960年代初期即已着手,屈指数十个年头过去。其间大好青春半属虚掷,真正作点事情,也就是近若干年份方才得以实现而已。

一个时期以来,著者对外国地名的某些方面,进行了些资料收集和理论探讨,写过

一些有关的论文和文章,出版过几本书。总的说来,委实零星、肤浅、单薄。深感还需不断地下大力气。而著者平居,无论阅览图书、翻检报章、凝视荧屏、倾听广播,以及其他种种场合,和外国地名有关的诸多现象和问题,又往往不期而至或扑面而来,迫使自己情不自禁地去注意、思考、究诂、探索;时时感到外国地名貌似区区,却往往关系匪浅,内里确实有太多的事项值得介绍,有成堆的问题需要探索。众多实例,都在证明著者并非张大其词,更非耸人听闻。这就愈益感到介绍、传播和普及外国地名知识的必要和迫切。尤其在我国当前波澜壮阔的改革的总形势下,在和环球几乎所有国家、地区交往日益密切、频繁的总形势下,尤其在“全球化”声浪高唱入云、“全球化”现象咄咄逼人之际,开展这项“工程”更显得需要、必要和重要,更显得时不我与,刻不容缓。而介绍、传播和普及外国地名知识,无疑是外国地名研究者无可旁贷的工作义务和社会责任。笔者忝列其中,应该为此殚精竭虑,倾尽绵薄。本书之成,就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种尝试和探索。

三

本书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专门著述,著者的本意,不在于利用本书作学理的深邃探讨,而是着力于外国地名知识的传播和有关信息的流布;所以没有专著那种必需、必备的严整科学体系,而是众多单篇文章的合集。但也绝非“乌合之众”。所有文字均经著者认真、仔细的安排、梳理:全书因此首尾一贯,具备了清晰完整的框架和秩然有序的布局,尤其章节井然,环球各大洲及其各大区和其中几乎所有国家,均排而列之,兼而及之。

就整体说,全书以“卷”为最大单元,辅以次一级的单元:“目”。共分为20卷、81目。前3卷属于总论性质;后17卷属于分论。首列综合—全球性文章,随后以各大洲——亚洲、欧洲、非洲、大洋洲、美洲和南极洲为序。洲内再按习惯划分的大区鱼贯排列。各洲文字繁简有差,卷数多少不等:计亚洲5卷(卷4至卷8),欧洲5卷(卷9至卷13),非洲2卷(卷14至卷15),大洋洲1卷(卷16),美洲3卷(卷17至卷19),南极洲1卷(卷20)。各包含多少不等的目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(地区),或单独、或分组系于目下。是以本书尽管篇幅较大,经过这么一番金字塔式的汇集,依然眉目清爽、层次分明。彼此之间,无论从大范围、中范围或小范围看,都有它一定的逻辑关联和内部联系。全部内容,分而可以各自成章,合而就是一应俱全的完备整体。

本书书名冠以“环球”二字,具有“概括”意义,而非“囊括”意义。无非表示全书卷、目,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泛,触及、涉及、论及全球所有的“洲”和“洋”以及其中大量的地名,并非说地球上的所有地名,弥不一网罗在内。须知,本书总的字数纵然

远逾百万,笔锋所及,也不可能“横扫”一切外国地名——没有这个可能,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书名中的“初探”一词也含义双关:既寓“初步探索”之意,又包含对外国地名分批、分期熟悉、认识的设想和预计:此为部分外国地名的“首批”亮相;随之将有“新探”、“深探”等踵接其后,对更多的外国地名陆续予以介绍(这当然须俟诸异日,非可“一蹴而就”)。

本书各文的写就与完成,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。相当多的文字,曾经以零篇散简的形式,发表于某些报纸(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上海《文汇报》等)、刊物(《地理知识》、《地名知识》、《地名丛刊》、《外国历史知识》、《地理教学》、《中国方域》、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、《世界地理集刊》、《社会科学战线》等);部分篇章曾收入某些论文集(《地名学论文集》、《地名学研究文集》^①);有的还曾集结成书(《外国地名谈丛》、《世界地名纵横谈》、《外国地名探源》^②)。本书则是著者前此有关外国地名文章的最新结集(绝大多数属于知识性篇什,其他专业性、学术性的论述均未收)。但须特别说明,所有这些文字,绝非原作的简单汇集,而是全部都经过细密、认真的检核、整饰,诸如文字的梳理、错别的校改、数据的更新、资料的补充、某些措辞用语的再斟酌以及其他应予纠正、理顺的地方,概不放过。有的行文因时过境迁、情况变化等,还进行了必要的删削和改写。在这些方面,著者花费了很多时间,投入了大量精力。

总地说来,本书各文,叙述力求深入浅出、通畅明白,以便激发读者的兴趣,使他们愿意看,又看得下去。著者还有意避免长篇大论,行文惟精赅是求,事情能三言两语说清楚的,决不拖泥带水、支离衍蔓。故而一般比较短小,多囿乎千字左右,少数可短到三五百字,长文属于例外。即使有洋洋洒洒数千言者,为便于读者披阅、浏览,也化整为零,分而“治”之。或标以上、下,或排以序数。要之,力图充分运用和发挥短文的长处和优势,以一贯之。

四

我国古人写书,“发明”和使用过“夹注”的办法,就是把补充、说明性的次要文字,用小号字双行夹置在正文有关字句下,阅读起来非常方便。可惜“西风”东渐后,人们把祖传的这种优良的置注办法,稀里糊涂地“扬弃”了,改用洋人洋书的“尾注”(又称

① 分别由测绘出版社、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② 分别由北京旅游出版社、世界知识出版社、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。

“文后注”)或“脚注”(又称“边注”、“页末注”)。这样的“革新”,也许排印上有某种方便,但苦了读者,看书时遇到这种注,眼睛必须上下移动,隔行跳跃;如果把注文全部附于文末甚至章节之末,则给读者增加更多不便,消耗更多时间。不少人为摆脱这种麻烦,阅读时干脆甩掉注文,径直往前“赶路”,但这显然又是不智之举。因为注文往往是正文必不可少的完善、丰满和补充,重要性每每不亚于正文,绝不可以“鸡肋”视之。有鉴于此,本书凡要说的话,一律在正文中和读者见面。除非非常必要,注文尽量避免。

论述外国地名的书,从一定意义上说,又是地理书,地理书少不了地图。著者在写书过程中,积累、草绘了许多地图附图,原拟适当插入,既利于读者更深刻、深入了解文字叙述,也兼符古人“左图右史”之义(何况当今之世,又是“图胜”、“图盛”时代,几乎要“无图不成书”!),惜乎苦于具体困难(?),只能“聊胜于无”地稍稍穿插若干,其他大批上好“备料”,不得不忍痛“割爱”。著者对此无可奈何,惟徒呼负负而已。但从整体、求全、趋时上看,这委实是一大缺陷和缺憾。此番已矣,愿有朝一日,书的“图路”畅通,可以轻而易举地弥补这种不足。

本书内容,涉及外国地名本身各种情况的方方面面。为应社会各方广大读者了解外国地名的需要,著者尽自己所知,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,提供有关外国地名本身“身世”的各种知识。当然,应该谈、需要谈、值得谈的,远不止本书已经谈到的这些。除本书已经涉及的以外,还有更多的话题要谈,更多的——却不见得是次要的——外国地名知识要介绍。而仅仅一本书,不拘容量大小,无论如何都是容纳不了的,这都只能别求出路。好在,著者在上文已经稍露“风声”:异日拟另出它著,以《环球地名新探》为名,作为续编献于读者面前。一旦实现,当可略补本书的缺欠。

五

综括本书的内容,似可归纳出如下几个特点。

第一,主要介绍外国地名本身的“身世”,追溯它们的命名准则、得名原委、语种源流、实际含义、语音结构、词形变化、嬗替更改、转写转译、分布规律等情况;探讨所有这些情况与自然—社会环境间错综复杂的依存关系,以及它们的某些别名、别(绰)号和相关的种种轶事、趣闻等。

第二,介绍外国地名,着重择“尤”选“要”,突出重点,画龙点睛。外国地名,浩如烟海。著者放眼全球,拣选最主要、最常见、最常用、最具代表意义、最足以说明某种或某些问题的地名;尤其注意撷取与某些重大历史—现实事件有关的地名,予以解析、阐发。

第三,特别致力于外国地名各方面、各类型舛错的匡正和纠误。著者在日常的资料

涉猎中,经常遇到有关外国地名的各种各样的差错。对此,著者在本书中多方予以搜寻、抉掘、探讨,指出失误的多种表现形式,进行必要的校正,并分析其原因,辨明其根源,以期外国地名中形形色色的失误,免于继续流传。

第四,介绍外国地名,或以某个具体地名为题,或以某些互有关联的成群、成组的系列地名为中心,专文论述。前者纵深发掘,后者横向联系,都力求以最少的篇幅,容纳最多的内容。

第五,全书结构既严整,又灵活,虽以全球各大洲以及它们各个大的区域为单元,但并不呆板,一般都是一题一议,各篇彼此既有隐然的内在联系,又自成一体,阅读起来,可随时随地开始,随时随地停顿,使读者感到方便。

第六,地名研究的综合性、交错性、跨界性和兼容性极强,外国地名研究,牵涉的方面更多、更广。有鉴于此,著者在阐述地名问题时,力求尽所能及,又恰如其分地联系相关学科诸如历史、民族、民俗、语言……乃至自然环境和经济活动等,以便把情况说得更深、更透、更周全。

本书总的情况既然大抵如此,对社会各方而言,谅必会有它比较宽广的意义和价值;出这样一本书,大约也就不算多余了。

六

本书从根本性质上说,属于地名学范畴,是一部解析地名本身——地名内部各种事实、现象和问题的地名学著作。它们的内容,基本、原则上仅仅作地名本身各个侧面——语种、语源、语义、语音、词形等的识别、探微、辩驳、求索、认定等。所以编次虽然按照地理上的大洲依序“排队”,却并非一般的地理书,对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的地理概况,不作描述(这是正规的地理著作物和一般地名辞典的任务)。有时出于必要,会叙及和地名有关的某些地理情况,但这也仅仅出于必要,只能稍稍及之,适可而止。

不过,这种安排是否适当、贴切——究竟是恰到好处,还是画地自限甚至“画地为牢”,需广大读者意见的反馈。因为就纯粹、正规的地名学著述而论,这不是一个问题,更不是一个难题——当然要区分、区别得很清楚,毋庸置疑。但就知识属性大于纯学术属性如本书而言,情况就有所不同,要求可能比较复杂些。兴许广大的读者更倾向于在了解外国地名本身“身世”的同时,能够同时、一并获得地名所代表的地理实体的某些(自然地理的和人文地理的)基本信息。知识探索上的这种“一箭双雕”的诉求,与一般人的学习心理“若合符节”,应该得到重视。不过,即使如此,本书本版已“暇不及此”,一切只好等待来兹了。

七

前文曾经反复申明,本书属于外国地名研究范围,所有篇章都“唯外国地名是瞻”,都围绕着外国地名“说事”;前此接受其中部分材料予以出版的,基本是一些综合性的出版社(包括出版工具书或兼出工具书的出版社),而现在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,可能有读者纳闷,是否似乎有点“文不对题”。依著者管见,其实不然。

首先,著者在上文曾经几度说明外国地名牵涉的广泛性、也一再强调外国地名知识的重要性和研究工作的迫切性。这其中所谓“广泛”,当然也把文艺(不拘其广义和狭义)包括进去。外国文艺作品往往(可能频繁)涉及外国地名,外国作家无论创作或生活,往往和外国地名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;突出的实例:外国古今很多作家的作品就直接以外国地名命名——例子之多,足以裒辑成帙,汇为长编。这样一来,我们接触(包括阅读、理解、翻译等)外国文艺作品,必然要同外国地名打交道。而事实上,据著者的了解(尽管了解的极其有限),我国出版的翻译外国文作品中,就包含相当数量外国地名方面的各种各样讹误。原因无它:译者拥有的外国地名知识比较欠缺,加之疏于查对,有以致之。至于有些作家(包括某些知名作家)写的国外旅行记、访问录之类,外国地名方面的差错、讹误,也所在多有(在著者这本书里,就举有这方面的事例)。凡此,都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:但与外国文艺作品打交道(各种各样!),还是具备点外国地名知识为好、为妥、为佳、为上。可以大胆地断言:假若我们具有一定(当然,越多越善!)的外国地名知识,那么,对于外国文艺作品,小之于阅读,大之于译介,都功莫大焉,利莫大焉。本乎此,著者认为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,并非“投错了胎”,反倒是对路合符。“百花”从本出版专业出发,需要出版这么一部书,何况著者从网上获取的本出版社简介中,见到这样的词句:“不断拓展选题,先后出版了中外文化类图书上百种,获得了普遍好评,也充分显示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整体实力”。可见,“拓展选题”本来就是“百花”的经营方针之一,甚至是办好、办大出版业务的一个明智决策和既定方向,而出版这么一本书,恰恰是“拓展选题”的一项具体表现。著者本着这些认知和认同,也就欣然乐意,把书稿交付“百花”出版,同时,对出版社领导由此表现出的眼光、识见和魄力,致以由衷的赞美、钦仰和敬意。

在本书从组稿到正式出版的一系列工作进程和环节中,出版社版权部主任杨进刚先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付出了辛勤的劳动。对此,著者深深感荷。只是蒙他登门造访和主动联系,敝书稿方才得以投身津门,投身“百花”,并迅速问世。对于本书的“降生”,出版社其他许多先生也与有功焉。借此机缘,一并志感。

曾世英先生(1899~1994)是我国现代地图学的奠基人之一,尤其是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,又是本书著者治学的带路人和永远尊崇、尊奉的师表,所以在本书出版时,首先想到的就是他老人家。为表达我心底的敬意,特把为纪念先生而写的《曾老——我心目中的高山与大海》,作为“卷首献辞”,置于全书的最前面。此外,著者在写这篇《本书撰写缘起述略》之际,还必须向胸怀坦荡、乐于助人的苏刚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。他对敝书稿的美好评价和给予的鼎力助掖,使我长铭于衷。

再者,在这里,还应该提到著者的两位师模和前辈郭敬辉(1916~1985)先生和高泳源(1914~1997)先生。他们工作上的兢兢业业,学术上的孜孜追求,尤其对后来者的无私扶助和热情奖掖,使著者终生难忘。其实,在业界,特别是(更准确、更严密些说)在后辈学人中间,对于他们处世的谦逊平和与为人的亮节高风,几乎是有口皆碑的,岂仅渺渺晚生如著者一人而已哉!

八

属文至此,笔者还必须为这部书稿的写成和编定,向逝去的亲人——我亲爱、敬爱和挚爱的妻子董履俭同志,表达难以缕述的怀念和感激之情。她为这部书稿,可说倾尽心力,其中凝聚了她无法估量的劳绩。没有她的襄助、参与和投入,这部书稿的早日写成和编定,都是绝对不可想象的。但正当书稿即将进入最后整理的关键、紧张时刻,她的宝贵生命却被病魔残酷地折磨,而且病情急转直下,很快就天人两隔,以致尚未一亲书稿的出版就遗憾瞑目。然而也多亏有她健在时共同构筑的坚实基础,同时托庇她在天之灵,使得著者在她不幸弃世后不算太长的期间内,仍能继续未竟的工作,以抵于成。

末了,笔者愿借这个机会,寄语广大读者,并恳祈各方的专家、学者,对本书惠予批评、斧正、指津。这是笔者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,决非虚语和套话。盖以在本书中,著者纵使极其当心,时刻警惕,竭力避免差错和谬误,但难免仍有差错和谬误存乎其间,因而深切希望大家不吝教诲,匡我不逮。

最后,本书涉及的动态资料、时间早迟截止于2007年底特此顺便说明。

刘 伉

2008年3月15日于北京

中国科学院苇子坑住宅小区

经纬居灯下